

新闻史研究思路和方法讨论述评

崔 萍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对新闻史研究思路和方法的批评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新闻史研究本体的迷失和错位,二是新闻史观的单一和相近。针对存在的问题,学界普遍提出:深化研究内涵,拓宽研究视野,运用新的方法。

[关键词] 新闻史;思路;方法;述评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9)02-0245-05

随着改革开放后整个新闻学学术研究语境的变化,学界纷纷对新闻史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得到持续关注,其讨论的深度和广度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入和拓展。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许多学人从不同角度对传统的新闻史研究进行了探讨、争鸣乃至批判,提出要用新的思路和方法来激活相对沉寂的状态。在此基础上,也有许多学人大胆尝试建构新的研究范式,并应用于写作实践。

学界的研讨主要从批评和建构两个方面展开,集中批评的是新闻史研究在思想方法上的整体缺失。

一、新闻史研究本体的迷失和错位

本体意识主要针对新闻史研究与政治史、思想史长期不分的状态提出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宁树藩先生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碰到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研究中抛开本学科的特性,使中国新闻史完全依附于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新闻史主体意识淡薄是其根本原因,而这也是制约新闻史研究走向深入和成熟的一个重要障碍。”^[1](第 29 页)“强调‘本体意识’,就是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各样的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2](第 4 页)

早在 1981 年 7 月由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联合举办的新闻史座谈会上,与会者就集中探讨了新闻史与党史、政治思想史雷同的现象及原因,认为主要表现在:一是将政治思想斗争作为新闻史的主线来研究;二是将“宣传什么”作了研究的重点;三是将办报人报纸的政治观点直接与新闻实践挂钩,忽视对办报思想的研究;四是将新闻史的范围搞得很窄,设置了许多禁区;五是将政治对新闻事业的影响绝对化、简单化^[3](第 118 页)。依循“解放思想”的先声,学界持续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批评,而反思也继续往前推进:集中针砭政治对新闻史的渗透或操纵造成新闻史研究和写作的简单化、教条化、庸俗化。“单一的政治视角简化了存在于新闻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从而缺少对新闻业内部结构和自身规律的整体观照。”^[4](第 24 页)“革命史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新闻史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化,出现了以阶级分析方法统领新闻史研究总体的趋向。”^[5](第 33 页)

意识形态化的新闻史研究往往漠视某些史实,造成研究和写作的缺失。“这种缺失主要来自于所谓‘政治正确’的约束,在近代以来的新闻史研究中表现尤为明显。按照习惯的说法,如果我们把报纸和报人的政治立场分为左中右,那么无疑代表政治正确的‘左’这一部分获得了进入历史叙述的优先权,而‘中’和‘右’两个部分则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乃至遮蔽,成为新闻史上的盲区”;“近代以来的新闻史,政治

立场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某一媒介能否受到关注。对于民营报纸、国民党党报的研究还相当不够,更不用说日伪政权控制的报刊”;“至今为止的中国新闻史对于传播者尽管有较多的研究,但主要集中在精英人物或浮在历史表层的突出事件的当事人身上,而那些在政治上有争议的人物和作为大多数的普通传播者却隐而不见”^[6](第 81 页)。

意识形态化写作带来新闻史著作在叙事上的缺憾:以粗线条手法勾勒重大历史事件来建构历史叙述形态,体制成为唯一的历史记忆,由此造成强势的宏大叙事模式对“人”的形象的淡化、遮蔽、涂抹。有论者指出,“在目前的研究中,不管是作为‘历史现场’中的人还是作为‘历史叙述’中的人,其行为主体的作用基本都被淹没了”^[7](第 74 页)。

二、新闻史观的单一和相近

新闻史观是新闻工作者对新闻发生发展历史的总体认识,它包括新闻是如何发生的,新闻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新闻与其它社会系统的关系如何等等^[8](第 23 页)。一定时期的新闻史观受同时期历史观的影响和制约。解放以来,史学研究领域一方面承续实证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史学研究的宏观架构^[9](第 18 页)。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正是吸取了这两个方面的资源得以建立,在新闻史研究领域,新民主主义新闻史观也在这一背景下确立了长期的统治地位。具体说来,“它以‘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为新闻史观,以‘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的‘政治功能’为关注焦点”^[10](第 8 页)。在这种传统的“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下,中国新闻史研究过去已取得巨大成绩,丁淦林先生曾将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和方汉奇主持编写的多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视为 20 世纪新闻史研究的三次突破:“这三次突破,各有特点,各从不同方面对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大致上说,第一次主要在新闻史料和新闻事业发展沿革描述方面,第二次主要在新闻报道内容及其社会政治作用的评析方面,第三次主要在新闻事业自身发展及其经验评述方面。”^[11](第 136 页)但是,“新民主主义新闻史观是对新闻历史的不同于前的一种整合,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的人们从经济和政治的语境中阐释新闻史的尝试。这种新闻史观固然有很多科学性,也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获得了合法合理性,但其弊端随着时间的发展也日渐显露出来。”^[8](第 24 页)单一的新闻史观带来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单调,传统的新闻史研究在方法上以实证为主,“力求以史料勾勒一事一物的原貌,再现客观的历史事实,甚至于不厌其烦地追索万千报刊的起止日期,堆砌云遮雾绕的如山史料。新闻史学在细目上精益求精,务使详备,在微观的事态上考证落实,虽一丝不苟,但在总体上却忽视深层的透视、宏观的把握和有机的联系”^[12](第 36 页)。因此,有学人指出:“中国新闻史研究从史料整理到描述性研究,都已经比较详尽完备,而且也体现了某些解释性研究的思路。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何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去开拓挖掘出史实的新意义,是一个新课题。”^[13](第 187 页)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老一辈新闻史研究者也对新闻史研究的缺陷有所警觉,并不断呼吁“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14](第 11 页),“学科内容应扩容”,并提出“把中国新闻传播史置于国际背景中来研究”,要“改进研究方法”^[11](第 138 页)。方汉奇先生还对今后的新闻史研究提出了具体的希望:首先应该突破传统的与各时期的政治紧密结合的范式,更多地从新闻传播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论述和研究新闻史。其次,要引入新的理论、方法,完成从单一的新闻史到丰富的新闻传播史的转向。再次,要多借鉴其它学科,如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史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由此,在实现新闻史研究的范式上有所创新^[15](第 37 页)。可见,新闻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已受到老中青几代研究者的重视。

三、新闻史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针对上述两大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了新闻史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一)力主深化研究内涵

有学者认为,“新闻传播史呈现出三个密切相关的层次,即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

观念,三者彼此依赖,相辅相成,共同建构了完整的新闻传播史体系。其中,新闻传播事业属于漂浮于水面的冰山的山尖,而新闻传播制度则是水线下的主体部分,新闻传播观念则是一个理论层次,是对于前面两个事实层的深度注解……完全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应该透过新闻传播的表象,穿越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的屏障,潜入到水线下冰山的更深层的观念部分,这样才能科学地解读、全面地展现新闻传播发展、进化的完整脉络。”^[16](第31页)

有学者谈到,“深入到新闻发展的现实基础——人的物质生产与交往的需要中去,从那里去寻找新闻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去发现新闻观念与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的广泛联系;深入到新闻内部结构及自身发展规律中去,从那里去认清新闻观念演进的历程和方位。”^[14](第25页)

还有学者指出,“新闻史研究从政治史和革命史的框架走出来,首先要回归新闻本体,转向传播学的‘5W’框架,在传播者、媒介、传播内容三个层面,应在原有的基础上,着力扫除研究的盲区;在受众和效果这两个层面,则要自觉开展系统的开创性的研究。回归新闻本体,从而为今天的新闻事业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寻找可供借鉴的历史资源。”^[19](第82页)

(二)倡导拓宽研究视野

有学者认为,“媒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也是一种社会子系统,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其它子系统也存在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即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在早期的媒介研究中,研究者的视野多集中在媒介内部,社会条件虽然也被提及,但多是作为媒介运作的背景,这样的视野虽能有效地处理很多问题,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以社会系统论来看,如果离开与其他社会系统的互动,就不可能对媒介有完整而透彻的理解。因此,从媒介的生态环境出发,媒介研究才能更加丰富和深化。”^[16](第82页)

还有学者从历史的横向发展角度对新闻历史的横向发展做了更具体的表述,认为应该关注三个层面的互动:第一是新闻系统内不同媒介间的互动关系;第二是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第三是新闻系统跨地域的互动^[17](第75页)。

另有学者指出,要“从文化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从受众的社会心理角度来进行新闻史的解剖分析。这种跳出庐山外的观察是为了获得一种新视角的全新感受,以期发现囿困于狭小新闻史本身所难以洞察掌握的新闻——社会互动规律”^[18](第184页)。

也有学者建议,应该建构“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概念层次上的世界新闻史,把中国新闻史作为一个有机部分放进去加以整体考察,按‘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理论去描述中国新闻业的真实历史过程”^[19](第20页)。

深化研究内涵,拓宽研究视野,代表着学界同仁在新闻史研究学术思想上实现突破的愿望,即实现三个方面的转换:“一是从微观的考据向宏观的把握转换;二是从表象的观察向深层的透视转换;三是从事实的描述向意义的阐发转换。”^[20](第013版)有学者回到新闻史研究本体的话题,从“媒介生存”的角度对此做了更充实的论述:“关于新闻史本体的探讨,应该包括‘是什么’和‘如何是’两个问题的回答。媒介生存是一种专业主义思路,它追求横向的历史思维,它把‘媒介——环境’作为自己思考观照的中心,这里所谈的横向思维,就是指从在场的历史到不在场的历史的意思。在场的历史,就是新闻人围绕媒介生存的新闻实践活动,是指呈现的历史,它包括新闻生产、媒介制度、新闻观念等三个层次;其次是不在场的历史,就是影响媒介的生存世界,其目的在于探讨媒介与生存环境的各种因素,即政治、经济、文化等组成的媒介生存环境”;“新闻史研究回到媒介生存世界,其目的在于探讨媒介与生存环境的互动交往,在这种交往中,探讨媒介生存环境的嬗变历程,探讨新闻人在建构和谐生存家园方面的不懈努力,就是要在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的互动平衡中重建媒介与环境相统一的、有价值、意义和目的的和谐世界”^[21](第78页)。

(三)提倡运用新方法

从研究方法的演进来看,许多学者都认为新闻史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除了传统的考据之外,定量分析、口述史、横向比较、跨学科研究等方法都应该得到重视。

有学者阐释了横向比较方法的意义:新闻史学比较研究的实质,就是运用共性和个性辩证统一的原理和方法,将某一历史时期一国新闻业发展之点提升到整个人类社会新闻业发展之面上来考察,分清哪些是共性的东西,哪些是个性的东西,从而确定本国新闻业在世界新闻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作用;同时,对其他国家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中的“普遍适用”的部分加以吸收、利用;具体说来,横向比较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新闻传播的发展进程,新闻传播思想,新闻控制形式^[23](第57-58页)。

有学者指出,口述史为解决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新的思路:可以扩展历史叙述权,打破新闻史叙述一元性和垄断性;能够生动地表现出个人或群体的历史意识和心理;完整地再现社会发展轨迹,丰富新闻史研究的维度;可以把新闻史研究推广到普通民众之中^[7](第74-75页)。

有学者认为应该吸收年鉴学派、历史人类学和新文化史等代表性流派的合理内核,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新闻传播现象进行研究,关注传者和受众的心态、日常生活与新闻传播之间的关系;运用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理论对传播内容进行分析^[9](第84页)。

也有学者主张借助新闻理论要素来建立新闻史的研究框架和体系^[23](第21页)。

纵览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受到集中批评,这几乎成为当时学界在“解放思想”后的本能反应,但囿于时代的局限,这时期还没来得及做更深入的思考;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学科学术内涵的提升,传播学和西方新史学理论的大量涌入,新闻史学界的一批中青年学者敏锐地认识到研究的滞后甚至边缘化,开始表达对现状的忧虑,并展开激烈的批评;进入21世纪,学界的批评和建构同时展开,前期积累的问题逐渐清晰,对问题的探讨也趋于成熟。

思路和方法的革新是新闻史研究深化和转型的前提。随着新闻史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苏醒,他们渴望冲破旧有的桎梏,开始批判意识形态化的研究模式,并力主树立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还新闻史作为一门专业的独立地位和尊严,将新闻史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构成的大环境中来考察,建构更真实的历史图景。这种建构背后的更大企图将是透过史实去追问新闻学的终极问题:媒介的和谐、自由如何达成。进入这一层面,意味着要穿透事业、制度进入新闻人思想和观念的深处去发掘历史演进的丰富内涵和意义,从而释放新闻史研究的思想光辉和历史批判力量。

新闻史研究有极强的时代性,每个时代的研究者面对的问题和环境都不一样,是现实的发展变化使得我们审视历史的眼光随之发生变化。对传统的反思并不代表否定,而是在“同情地理解”的基础上适当地扬弃。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新闻史研究的成绩正是在不断的反思和革新中取得的。而动力来自语境的变化,从理念的层面上来看,一是理性调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使得新闻学的独立价值得到承认,对新闻内在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更加丰富和深刻,因而带动了新闻史研究的发展和革新;二是现代“新史学”的影响波及到中国现当代的史学研究领域,由此所引发的观念变革也引起了不少新闻史研究者的兴趣:一方面,新史学的理论资源为新闻史研究开拓了视野,另一方面,新史学思想中对主体的重视唤醒了学界一度沉睡的主体意识,引发了他们对传统的质疑和不满,并进而寻求新的方位。从现实的层面上来看,中国的新闻业在近30年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日新月异的现实,勾连当下与历史的热情也使研究者自觉地寻求突破。

在现阶段,如何丰富学科的内涵、提升学科的品位、凸现学科的个性,仍然是摆在每位研究者面前的问题。有学者在谈到新闻史研究面临的挑战时指出:“深化,就是要在全面考察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加强理论观念的阐释与客观规律的探索。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沿着这样的思路向深度行进:历史过程的描述——经验概括——规律探讨——哲理分析。”^[11](第139页)从发掘规律上升到哲理分析,这就是本学科要追寻的一种学术理想。

[参 考 文 献]

- [1] 宁树藩、曾建雄:《强化本体意识,探求自身规律——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载《新闻大学》1998年第9期。
- [2] 郭丽华、宁树藩:《树立“本体意识”、探索新闻特性、加强新闻史学科建设》,载《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
- [3] 秦绍德:《中国新闻史学术讨论综述》,载《新闻大学》1982年第4期。
- [4] 单 波:《论20世纪中国新闻业和新闻观念的发展》,载《现代传播》2001年第4期。
- [5] 吴文虎:《本体迷失和边缘越位——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误区》,载《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 [6] 田秋生:《重写中国新闻史:必要性及其路径》,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 [7] 林溪声:《口述史: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路径》,载《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
- [8] 胡正强:《论新闻史观与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载《新闻知识》2006年第1期。
- [9] 程曼丽:《也谈新史学:关于新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载《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 [10] 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载《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 [11] 丁淦林:《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载《复旦学报》2000年第6期。
- [12] 李 彬:《对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建议》,载《新闻大学》1996年冬。
- [13] 陈昌凤:《从哈德森到夏德森:美国新闻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谈》,载方汉奇:《新闻春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14] 刘书峰:《新闻史学研究:突破口在哪里——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赵玉明教授》,载《新闻与写作》2005年第10期。
- [15] 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载《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2期。
- [16] 张 昆:《新闻传播史体系的三维空间》,载《新闻大学》2007年第2期。
- [17] 张 昆:《横向发展——新闻史研究的新纬度》,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4期。
- [18] 李 磊:《比较新闻史学刍议》,载《兰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 [19] 单 波:《“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中国新闻业命运的整体观照》,载《现代传播》1995年第4期。
- [20] 李 彬:《历史是新闻的定稿》,载《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2月15日。
- [21] 阳海洪:《媒介生存:关于新闻史研究本体的思考》,载《当代传播》2008年第2期。
- [22] 程曼丽:《横向比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思路》,载《新闻大学》1997年春。
- [23] 王润泽:《专业化:新闻史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的思考》,载《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4期。

(责任编辑 车 英)

Summary of Research Ideas and Methods of News History

Cui P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researchers have discussed about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news history. Their researches focus on two aspects, losting and dislocation on the body of its research, and the single and similar natures of its historical view. For solving these problems, the jouranlistic society put out 3 methods: deepening the connotation of its research, broadening its research vision, using its new methods.

Key words: news' history; research ideas; methods; summary